

# 中國初期鉛釉陶器新資料

謝明良

有關中國鉛釉陶器的出現年代問題，學界迄今尚未達成一致的看法。相對於歐美、日本絕大多數的陶史學者相信中國鉛釉陶器始燒於戰國時期，中國方面學者卻都認為其國鉛釉陶是出現於西漢武帝（西元前一四〇—八七）的關

中地區，<sup>〔註一〕</sup>並且參照河南燒溝漢墓等發掘資料認為：年代較早的作品多呈黃褐色釉，宣帝至王莽時出現了於同一器上施加黃褐、綠的多彩釉，綠釉則是在漢成帝時期才開始問世的。<sup>〔註二〕</sup>中國學界之所以會和歐美日學者在鉛釉陶出現

年代上有如此巨大的落差，其原因似乎不難理解，那就是中國學者在討論鉛釉陶起源問題時始終未曾提及被歐美、日本學者視為極可能屬戰國鉛釉陶器的幾件分別收藏於英、美、日的作例。我個人認為，除非鉛釉陶戰國起源說荒謬到不值



圖一 戰國 鉛釉彩陶罐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



圖二 戰國 鉛釉彩陶罐  
美國尼爾遜美術館（Nelson Gallery Atkins Museum）藏



圖三 戰國 鉛釉彩陶罐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四a 戰國 鉛釉彩陶盒 瑞士梅茵堂藏 (Meiyintang Collection)



圖四b 戰國 鉛釉彩陶盒 盒蓋 瑞士梅茵堂藏 (Meiyintang Collection)



圖四c 戰國 鉛釉彩陶盒 盒身 瑞士梅茵堂藏 (Meiyintang Collection)

一駁，否則應有義務於論文中交待此說或逕行批判。這樣看來，中外學界對於中國鉛釉陶器起源年代的歧異，應該是由於中方並未掌握到歐美、日等國的研究動態所導致？

那麼，歐美、日本收藏的所謂戰國鉛釉陶是否確實可

靠嗎？被比定為戰國鉛釉陶的作品當中以一群於紅陶胎上以「玻璃漿料」裝飾模倣自戰國時期玻璃珠（蜻蜓玉）紋樣的帶蓋小罐最為著名。截至近年所知，這類器形和彩飾大同小異的陶罐計四件，分別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美國波士頓

美術館（圖一）、美國尼爾遜美術館（圖二）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圖三）。（註三）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梅原末治已在 Laurence Sickman 將傳安徽省壽縣出土、現藏美國尼爾遜美術館的該類小罐之年代訂定於紀元前三世紀戰國後期的基



圖五 戰國 鉛釉彩陶罐 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



圖六a 戰國 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器 中國江蘇省鴻山大墓出土



圖六b 同上 俯視



圖七 戰國 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器 中國江蘇省鴻山大墓出土

礎之上，進一步指出陶罐上的玻璃漿料裝飾和洛陽金村出土戰國玻璃珠的類似性。<sup>〔註四〕</sup>其後，美國波士頓美術館Hoyt Collection和大英博物館Mrs. Walter Sedgwick Collection所藏同類小罐亦經X射線衍射等分析，目前已初步證明陶罐上的玻璃漿料應即低溫鉛釉。<sup>〔註五〕</sup>

如果說，上述和玻璃蜻蜓玉紋飾相近的彩飾罐非典型鉛釉陶，而與戰國玻璃珠或陶胎飾彩珠有較大關連，卻也難

否認其係於陶胎上施加鉛釉彩這一事實。應予一提的是，數年前出現於市肆後由瑞士梅茵堂購藏的一件戰國陶盒，也是以玻璃漿料彩飾聯珠紋飾（圖四），<sup>〔註六〕</sup>其和上述陶罐應屬同類製品。其次，尼爾遜美術館陶罐傳說出土於安徽省壽縣，<sup>〔註七〕</sup>而Regina Krahl則指出梅茵堂戰國彩飾盒的形制和湖北雲夢秦墓的漆器盒有相近之處。<sup>〔註八〕</sup>

另一方面，當學界苦思上述所謂戰國鉛釉陶的產地而不



圖八 陶胎琉璃珠（最右列四件） 傳中國河南省洛陽出土

得其解，甚至幾乎要疑心起這類風格近似、並且又非考古發掘出土的特異作例會不會竟是一批近人偽造的贗品？中國浙江省私人收藏家（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則又公布一件同類聯珠紋罐（圖五），但將之標示為商代「原始陶罐」。

〔註九〕由於該收藏家的藏品多來自杭州古物市場，所以不排除這件戰國鉛釉陶罐可能出土於浙江省或鄰近地區？

說來實在很巧，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考古學者發掘江蘇省無錫市錫山區鴻山鎮東北約一公里處戰國越國貴族墓地時，於邱承墀一號大墓（WHDVII MI）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四件「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器」（圖六、七）。〔註十〕除了器形之外，其於陶胎上賦彩的作法和所謂陶胎琉璃珠（圖八）或上述戰國鉛釉器大體一致。邱承墀一號大墓為長方形覆斗狀土墩墓，東西向，封土長七八·六公尺、寬五



圖十 戰國 蛇鳳紋玉帶鉤 中國江蘇省鴻山大墓出土



圖九 戰國 青釉甬鐘 中國江蘇省鴻山大墓出土

○：八公尺、高五·四公尺。墓葬位於土墩中部，平面呈「中」字形，由墓道、墓室和後室所構成，墓室內另有木板隔間成主室和南、北側室，主室長二三·六公尺、寬六·三公尺，後室長十一·九公尺、寬三·二公尺，墓道長二一·



圖十一-a 秦代 漆盒 中國湖北省雲夢出土

二公尺，後者南壁設長三·四公尺、寬○·九公尺、高○·五公尺的長圓形壁龕。墓葬整體規模宏大，雖然早年被盜，出土遺物仍達一千零九十八件之多。除了此類玻璃漿料彩飾球形鏤空陶器之外，另伴出大量的高溫灰釉盃、匜、鼎、



圖十一-b 同上



圖十三 「釉陶杯」？ 中國甘肅省天水戰國墓出土



圖十二 戰國 鉛釉壺 美國尼爾遜美術館 (Nelson Gally-Atkins Museum) 藏

甬鐘、句鑿等禮樂器(圖九)  
(註十二)以及鑲嵌玻璃珠和玉製  
 「蛇鳳紋帶鈎」(圖十)。(註  
十二)後者玉帶鈎四角向內出鳳  
 首，四蛇身與四鳳相連，蛇身  
 穿過中心圓環之構思其實和同  
 墓出土「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  
 器」之裝飾意念一致。由於邱  
 承墩一號墓戰國墓所出高溫灰  
 釉器均來自浙江境內越窯所燒  
 製造，而玉器也極可能為越地所  
 製造，據此可以推測同墓伴出  
 之「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器」  
 可能為浙江或鄰近之南方地區  
 所生產？如果此一推測無誤，  
 則邱承墩一號大墓的「琉璃釉  
 盤蛇玲瓏球形器」或可間接證  
 實前述戰國小罐或盒之產地有  
 可能也是在長江流域？就此而  
 言，分別收藏於美國尼爾遜美  
 術館和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  
 館的戰國玻璃漿料陶罐，前者  
 據稱出於安徽省壽縣，後者則  
 被視為越地商代製品，此雖均  
 止於傳說和臆測，但若除去定  
 年的錯誤，其傳稱出土地點亦

耐人尋味。不過，我們也應稍  
 加留意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  
 四三號秦墓所出形制和梅茵堂  
 玻璃漿料彩飾陶盒(同圖四)  
 頗為相似的漆盒(圖十一)，  
(註十三)其盒身和蓋分別烙印  
 「咸包」和「亭上」字銘，說  
 明漆盒可能是在秦都咸陽(今  
 陝西省咸陽市)官府監管下所  
 製作的。另外，如前所述，河  
 南省洛陽金村也曾出土表飾  
 鉛釉彩的陶胎琉璃珠(同圖  
 八)。

除了上述幾件於陶胎上施  
 玻璃漿料的製品之外，歐美、  
 日本的學者一般還都相信現藏  
 美國尼爾遜美術館，傳洛陽金  
 村韓君墓出土的綠褐釉螭紋蓋  
 壺(圖十二)(註十四)亦屬戰國  
 時期鉛釉陶的珍貴實例。該綠  
 褐釉壺雖是未經正式考古發掘  
 的個別存世遺物，但就外觀看  
 來，整體施單溶融的鉛釉，器  
 形和紋飾與戰國時期銅器酷  
 似，所以我也傾向其為戰國鉛  
 釉陶器。



圖十五 東漢 青釉五管瓶 中國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十四 東漢 鉛綠釉四管瓶 中國浙江省上虞出土

另外，中國方面的研究者亦曾對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上海青浦縣金山墳遺址水井遺跡出土的一件被定年於戰國的黃

釉泥質紅胎雙繫罐，進行表面釉層定性（光譜）分析，結果表明雙繫罐上的黃釉屬低溫鉛釉。（註十五）我雖未見實物，但



圖十七 東漢 鉛綠釉五管瓶 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



圖十六 東漢 鉛綠釉四管瓶 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



圖十八 東漢 鉛綠釉虎子 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

從報告書揭示的圖版看來，上海出土的雙繫罐的確實年代是否可上溯戰國時期？頗有可疑之處，所以似可暫時不予理會。另外，二〇〇六年發掘甘肅天水張家川馬家塢戰國墓也出土了一件報告書所謂的「釉陶杯」，<sup>〔註十六〕</sup>不過從揭載的彩圖看來（圖十三），我個人傾向其有較大可能為玻璃器。如果以上判斷不錯，那麼尼爾

遜美術館所藏的綠釉壺無疑仍是戰國鉛釉陶持論者極重要的例證之一。不過，學界對於戰國至西漢早期之間鉛釉陶的燒造情況，目前仍一無所知。雖則據報導，山東省臨沂西漢早期曾出土所謂黃釉壺和鼎，<sup>〔註十七〕</sup>但我觀察圖片後認為其有較大可能屬高溫灰釉器，而非低溫鉛釉。其次，森達也曾指出陝西西安市南郊伴出有和景帝陵（西元前一五六—一四一）類似裸體陶俑的新安機磚廠所出，報告書所謂施罩米黃色釉的泥質陶壺或為鉛釉陶器。<sup>〔註十八〕</sup>然而報告書未載圖版，詳情不明。雖然如此，考慮到同墓伴出的兩件施罩黃綠色釉的「釉陶罐」之器式以及掛半截釉的施釉特徵均酷似南方高溫灰釉器，<sup>〔註十九〕</sup>因此不能排除未揭載圖版的泥質「釉陶壺」，可能亦屬南方高溫灰釉器？

儘管漢代鉛釉陶器明顯以今北京、河北、山西、山東、

河南、陝西等北方地區出土頻率最高，數量也最豐富，以致於以往有學者將漢代鉛釉陶逕稱為「北方釉陶」。<sup>〔註二十〕</sup>然而黃河流域之外，長江流域部分省分或西南地區四川省漢墓，甚至漢武帝於元封三年（西元前一〇八）在今韓半島平壤所設置的樂浪郡遺址都曾出土鉛釉陶器。

數年前，我曾經由器形的比對初步地確認了江西境內南昌市等地東漢墓出土的釉陶器應是當地所生產的南方鉛釉陶。<sup>〔註二一〕</sup>當時雖也懷疑做為南方高溫灰釉最為重要的產區，長江下游浙江越窯系瓷窯可能亦曾燒製部分鉛釉陶器，可惜並無確實的考古案例。幸運的是，近年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正式公布同省上虞驛亭謝家岸後頭山第十一號東漢墓出土的一件四管瓶。其是於平底的葫蘆式罐的下方罐身部位等距貼付三管，表施褐綠色釉（圖十四），<sup>〔註二二〕</sup>整體造型



圖二一 東漢 越窯黑釉柱形堆塑壺 中國浙江省鄞縣漢墓出土

和長江下游地區東漢至三國墓中常見的俗稱五管瓶（圖十五）的器式有明顯的親緣關係，〔註二三〕無疑是該地區所生產。我雖未能親見實物，但從報告書所揭示的彩圖看來，其器表薄施綠釉，有明顯流釉淚痕，積釉處呈鮮豔翠綠色調，缺損部位露胎處呈帶鬆脆質感的肉白色，所以應該就是以低溫燒成的鉛釉陶器。如果此一判斷無誤，那麼這件發掘報告

書將之和南方高溫灰釉相提並論且被共同歸類於「釉陶」的製品，就可做為高溫灰釉中心產區之浙江地區亦燒造有低溫鉛釉陶器的重要例證。

正當我因浙江東漢鉛釉陶器的確認而雀躍不已，其實卻也憂心此一孤例是否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誤判？無獨有偶，我再次幸運地從圖錄得知，上述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也收藏有多件從器式上可判斷應



圖十九 東漢 鉛綠釉柱 中國浙江省上虞博物館藏



圖二十 東漢 鉛綠釉多管瓶 中國浙江省上虞博物館藏

## 註釋：

-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114。
- 李知宴，〈漢代釉陶的起源和特點〉，《考古與文物》1984年2期，頁94。
- 目前所知這類小罐計四件，分別收藏於大英博物館（Mrs. Walter Sedgwick Collection）、波士頓美術館（Hoyt Collection）、尼爾遜美術館和東京國立博物館。其簡要的討論可參見弓場紀知，〈中國における鉛釉陶器の發生〉，《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4（1998），頁21-36。
- 梅原末治，〈玻璃質で被ふた中國の古陶〉，《大和文華》15（1954），頁8-13。
- Jan Foutein, *Oriental Ceramics*, vol. 10, pp. 172-173 吳同的解說（Tokyo: KODANSHA, 1980），p. 65。以及 Nigel Wood and Ian Freeston，〈「玻璃漿料」裝飾戰國陶罐的初步檢測〉，收入郭景坤編，1995年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古陶瓷科學技術》3（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7），頁21。
- KAIKODO JOURNAL（懷古堂）XIX（2001），pp. 220-223.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vol. Three (I)（London: Paradou Writing Ltd., 2006），pp. 122-123.
- 梅原末治，前引〈玻璃質で被ふた中國の古陶〉，頁9。另弓場紀知，前引〈中國における鉛釉陶器の發生〉，宣稱尼爾遜美術館和大英博物館藏品傳出土於洛陽金村、東京博物館藏品傳出土於安徽省壽縣（頁26），對此本文不予採信。
- Regina Krahl, op.cit., p.77.
- 陳國禎編著，《越窯青瓷精品五百件》上（杭州：西泠印社，2007），頁1。
- 南京博物院等，《鴻山越墓出土禮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圖131-133。
- 南京博物院等，《鴻山越墓出土樂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圖5。
- 南京博物院等，《鴻山越墓出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圖6。
- 東京國立博物館，《漆で描かれた神秘の世界—中國古代漆器展—》（東京：トヨタ財團，1998），頁126，圖59的解說參見。
- 長谷部樂爾編，《中國美術》卷5·陶磁，圖4及頁216同氏的解說。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張明華），〈上海青浦縣金山墳遺址試掘〉，《考古》1989年7期，頁589所附陳士萍〈青浦縣金山墳遺址二件陶罐的鑑定〉及圖版壹之1、2。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周廣濟等），〈2006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9期，頁12，圖19。
- 臨沂市博物館（沈毅），〈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11期，頁50，圖37。
- 森達也，〈中國における鉛釉陶の展開〉，收入《陶器が語る來世の理想郷中國古代の暮らしと夢—建築、人、動物》（愛知縣：愛知縣陶磁資料館，2005），頁120。
- 鄭洪春，〈陝西新安機磚廠漢初積炭墓葬發掘報告〉，《考古與文物》1990年4期，頁52，圖22之2。
- Wang Zhong Shu, *Han Civiliz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p. 144.
- 謝明良，〈有關漢代鉛釉陶器的幾個問題〉，收入《漢代陶器特展》（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頁18-20。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滬杭甬高速公路考古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80及頁282，圖14之1、圖版43之1和彩版29之1。
- 李剛主編，《青瓷風韻》（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92。
- 陳國禎，前引《越窯青瓷精品五百件》，頁82、83、115、120。
- 李剛，〈識瓷五箋〉，《東方博物》26期（2008），頁10，圖左上、左下。
- 朱伯謙，《越窯》（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1），圖6。

屬浙江製品的東漢時期鉛釉陶器，其器形除了四管瓶（圖十六）、五管瓶（圖十七）之外，還包括水井模型和虎子（圖十八）等，（註二四）釉色也有綠釉和褐釉兩種。除了私人籌設的浙東博物館藏品之外，

最近由浙江博物館研究人員披露的所謂「東漢褐釉窄塔波」（圖十九）和「東漢黑釉三管瓶」（圖二十），（註二五）在我看來也是確切無疑的鉛釉陶器，而其器式特徵因和越窯高溫灰釉器一致（圖二一），

（註二六）從而又可判斷應是浙江地區瓷窯所燒造，是一群前所未知、珍貴的漢代浙江鉛釉陶器。



作者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